

# 經濟情況與選民投票抉擇

黃 秀 端 \*

在經濟與政治關係日益密切以及經濟對於我們日常生活之影響日益加深之今天，選民對於經濟情況的態度是否會影響其投票意向，乃是學者關切的課題。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在此方面的研究指出選民對於總體經濟情況之看法確實會影響其投票行爲，且選民對於整體經濟情況之主觀看法，確實反映了國家客觀之經濟情況。

根據本文對於台北縣立委選舉研究發現，選民對於國家經濟整體之看法以及對個人自身經濟狀況之評估皆與黨派抉擇呈現顯著之相關，但是相關係數並不高，而且當其它因素加入時，經濟之影響力便因此而消失。

經濟因素對台北縣選舉不具解釋力，可能與兩黨對於經濟問題之態度並不明顯，以及選民也不認爲經濟問題是目前最重要最迫切需要解決之問題有關。在統獨問題和台灣前途問題等象徵性議題仍舊是構成選舉中重要的主題時，經濟問題之影響力不易顯現是可以理解的。

政治與經濟關係密切乃是眾所週知之事，特別在二次大戰以來，政府扮演的角色日趨積極，政府的政策對經濟情況的發展，有決定性的影響。同時，百姓對政府在經濟上應扮演何種角色的看法，也由過去「管事最少的政府，便是最好的政府」轉變爲政府應該爲國家經濟的榮枯來負責。

既然政府應該爲經濟情況的好壞來負責，學者們遂開始關心，選民是否會以選票來懲罰那些在經濟政策表現不好的執政黨？換言之，是否當一個國家經濟繁榮時，選民便支持執政的政黨或候選人；相反地，當經濟蕭條時，便唾棄執政黨，轉而支持反對黨。

在民主國家中，選民透過選舉來決定政府的去留，因此，不僅是政府對於選舉與經濟之間的關係感到關切，政治學者和經濟學者對此種關係亦甚感

---

\* 本文作者係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專任副教授。

興趣，所以在美國以及西歐各先進民主國家，有關經濟與選舉方面之研究不勝枚數，然而我國在此方面的研究令人汗顏，有待學者們努力。

爲了彌補以上之缺憾，本文旨在瞭解台北縣選民是否有所謂的經濟投票，如果有經濟投票行爲；究竟他們是以國家整體經濟情況之好壞，爲投票抉擇之標準？還是以個人經濟情況來衡量呢？如果無經濟投票行爲的存在，那麼究竟是那些因素才是決定選民投票行爲的原因呢？

## 總體經濟情況與執政黨得票率

經濟問題成爲投票行爲研究主題之一，主要是因爲經濟影響人民的生活鉅大。經濟的繁榮與凋零，是人民切身可以感受到的，因此對此的反應也較明顯。

研究經濟與選舉關係的著作，基本上可分爲兩大類。第一大類著眼於檢驗一國總體經濟情況的變化以及執政黨得票率的高低，所謂總體經濟情況的指標不外乎經濟成長、通貨膨脹率以及失業率。由於一次選舉中之總體資料只有一個值，無法觀察兩者之關係，因此要瞭解執政黨的得票是否繫於其在經濟上之表現，勢必要做長期的觀察。

第二類的著作則是以選民個人的角度來觀察選民投票抉擇是否與他對於經濟情況的認知相關，這類的研究多以調查研究資料來分析。

開啓總體經濟與選票間關係研究之先鋒乃Gerald Kramer (1971)對美國國會議員選舉的研究。根據Kramer分析1896年至1964年六十八年之間的國會選舉發現，在位總統所屬政黨的國會議員的得票率確實是隨著國家經濟情況的變化而波動。在幾個總體經濟指標中，個人平均實質所得(per capita in real disposable income)是預測執政黨是否得到選民青睞最好的指標，此研究通常被稱爲總體經濟研究的在職者假設(incumbency-oriented hypothesis)。

Kramer的研究刺激不少的學者從事此方面的研究。儘管學者們對於究竟那一個經濟指標最具解釋力有所爭論，但是經濟表現與選舉結果之間的關係是相當強烈的。

有些學者(Mackuen, 1983; Kernell, 1978; Henski, 1977)認為通貨膨脹率較為重要，因為物價上漲是普遍性的，是全民皆可以感受到的。亦有些學者認為失業率的影響力較為明顯(Nordhaus, 1975; Hibbs, 1979)，因為失業者對於此種情況之感受較為強烈，且此種感覺會波及於其親朋好友。另外，失業率高時，可能會造成人心惶惶，不知自己何時也可能遭到被解僱之命運。此外也有些學者發現個人平均所得的改變(Kramer, 1971; Erikson, 1989)是最為重要的變數。同時，學者發現此種關係不僅是在總統選舉中表現出來(Fair, 1978; Kernell, 1978)而且是在國會議員選舉中呈現(Tufte, 1975; Bloom & Price, 1975; Lepper, 1974; Lewis-Beck & Rice, 1984; Hibbs, 1987)。

在英國、法國、西德等民主國家亦同樣發現執政黨的選舉命運實繫於其在經濟上的表現(Lewis-Beck, 1988; Chap. 2; Latay, 1985; Kirchgassner, 1985a, 1985b; Norpoth, 1987; Goodhart & Bhansali, 1970)。Lewis-Beck (1988, Chap. 6)更進一步發現選民對於經濟情況之評估已超越傳統的社會階級(class)和意識形態(ideology)，成為歐洲主要民主國家中決定政府在位與否最重要的力量。

不同政黨有不同的政治理念，而他們在制定和執行政策時也會有不同的優先順序，在經濟政策方面，雖然維持物價穩定和無失業率皆是我們所希望達成之目標，然而大部份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皆相信此兩種目標是相互衝突的。提高就業率，減少失業率會造成物價上漲；而控制物價，將會促使失業率之提高，此乃所謂的非力蒲曲線(Phillip Curve)。因此，面對此種情況，民主黨和共和黨有不同的經濟目標優先順序。民主黨傾向於減少失業率，共和黨則以物價穩定為首要目標。既然政黨有不同的政策目標，選民可能也會以政策考慮為主，因此有所謂的政策取向假設(policy-oriented hypothesis)。

政策取向假設強調不管那一黨的總統在位，在失業率居高不下之時，選民會給予主張提高就業率的民主黨候選人較高的支持；反之，在通貨膨脹高漲之時，選民則較會支持強調物價穩定的共和黨。此方面的實證研究較少，其結果顯示在失業率高時，選民確實較會支持民主黨的國會議員候選人及總統候選人。但是在通貨膨脹和平均所得方面則是較傾向於支持在職者假設(Goodman & Kramer, 1975; Meltzer and Vellrath, 1975)。

總而言之，無論是在職者假設或政策假設，總體經濟與選舉結果的關係是肯定的。儘管在集合資料的分析顯示，經濟情況與選舉的強烈關係，然而總體資料的分析並無法瞭解個別選民之抉擇是否以經濟情況來考慮。什麼經濟情況，國家總體或個人荷包，是選民所考慮的？選民對於經濟的關切是否重於其它因素？選民對於政府或政黨表現的評估是根據他們過去的表现，還是考慮他們未來的前景與規劃？長期的總體經濟指標分析，並無法解決這些問題，遂有學者以調查研究的方式，來分析選民個人的偏好。

## 選民對經濟情況的認知與投票行爲

在個體資料方面，主要處理下列問題：究竟是選民對國家整體經濟情況的認知會影響選民的投票決定？還是選民對個人經濟情況的衡量較會影響選民的抉擇？或是兩者皆是選民考慮的重要因素。

### 國家整體經濟評估假設 (National Assessment Hypothesis or Sociotropic Hypothesis)

有些學者認為選民對於國家經濟情況好壞的衡量會影響他們決定是否投給執政的候選人，如果選民認為經濟繁榮時，便會傾向於繼續支持執政黨，如果他們覺得經濟萎縮或不景氣時，便會唾棄在位的政黨，此種假設，學者稱之為Sociotropic hypothesis (Kinder & Kiewiet, 1979, 1981, 1983; Feldman, 1982, 1985; Weatherford 1983)。當然採此類看法的學者並不主張一般選民對於總體經濟要有充分的瞭解，只需要選民對於國家經濟情況簡單的評價而已。由於近年來選民對於經濟情況的關注以及大眾傳播媒體的報導，選民對於經濟情況的評估並不如想像那麼難，況且根據Kiewiet (1983)的分析，選民對於國家經濟榮枯的認知確實反映了客觀經濟情況。

## 荷包假設(Pocket Hypothesis)

另外一派學者則認為個人或家庭經濟情況的好壞才是真正決定了選民之投票行爲(Fiorina, 1978; Klorman, 1978)。個人如果覺得自己或是其家庭的經濟情況改善，便較可能支持執政黨，若是覺得個人的經濟情況比過去差，則傾向於支持反對黨，個人的經濟狀況，收入情形或失業與否是個人和其家庭成員最能深切體會到的。

就如同Adam Smith所言，「個人對於自己的喜樂與哀痛較其它人的感受為大」此種刻骨銘心的感受，自然會影響他們的投票抉擇。

不過，Pocket hypothesis最重要的邏輯環節在於個人是否將他個人的經濟狀況改變歸諸於政府。假如他相信他個人經濟狀況之改變與政府無關，那麼他就沒有必要以選票來懲罰執政黨(Lewis-Beck, 1988: 35-36)。

理論上，荷包假設的訴求力似乎較為強烈，因為個人對於自身經濟情況之變化是親身體驗於日常生活中，然而實際研究結果，Sociotropic hypothesis對於美國選民投票行爲的解釋力較高。根據CPS (Center for Political Studies)的調查，美國選民似乎傾向於將個人的經濟情況以及國家的景氣兩個問題分開，他們認為個人經濟情況的好壞應該由個人來負責，至於國家整體經濟的表現才是政府應該負責的(Brody and Sniderman, 1977; Schlozman & Verba, 1979: 194)。當然個人經濟狀況的變化會影響他們對於整體經濟繁榮與否的認知或評估，然而整體說來，此兩者之相關性並不大。利用Probit estimate把此兩變數同時放入公式時，Kinder and Kiewiet (1979, 1981)和Kiewiet (1983)發現個人的經濟情況和對國家經濟之衡量兩變數對於選民之於總統候選人的抉擇皆有獨立的影響，但是對國家整體經濟表現之評估所佔的份量遠比個人經濟情況好壞為重。至於在國會議員選舉方面，個人經濟因素的影響遠比總統選舉為小，且其結果較不穩定(Kiewiet, 1983)。

由於前面的研究以cross-sectional data為主，且通常以一次的選舉作為分析，無法瞭解時間的變化對於經濟投票之影響。Markus (1988; 1992)則同時運用cross-sectional的資料加上長時期的分析(pooling data)，其結果更加證實了先前

的研究，亦即雖然個人經濟情況對選舉有影響，然而國家經濟之評估對於選舉結果之影響更為重要。

## 研究方法

影響投票行為的因素很多，社會學研究途徑(Sociological approach)學者強調個人所屬的團體會影響選民的投票決定(Berelson, Lazarsfeld, and McPhee, 1954)；心理學研究途徑(Psychological approach)的學者則認為選民的政黨認同是預測選民投票行為最好的指標，此種認同是來自於選民內心對政黨之支持(Campbell, Miller, and Stokes, 1960)。然而一個人的社會團體背景以及政黨認同兩種因素，皆是經由長期發展而且穩定之因素，並不易改變，因此是屬於靜態的因素。換言之，假如每個人都以社會背景或政黨認同為投票依據，那麼政黨的得票率勢必很難隨著不同的選舉而波動，我們便難以解釋為何民進黨的得票率由八十年國大選舉的21%，在短短一年之間，於八十一年之立委選舉增為31%。其間勢必有短期的因素，造成選票之波動。而短期因素可能包括：候選人因素、競選活動與策略以及議題之訴求。經濟因素乃是議題訴求的一部分，自1970年以降，由於受到石油危機之衝擊，經濟問題便成為民眾非常關心的問題，甚至可以左右選舉結果。卡特和布希兩位競選連任之總統，皆因為經濟的蕭條而下台，密特朗所領導的社會黨聯盟也因為未能解決法國經濟問題，而於1993年國會議員選舉中慘敗。

經濟投票理論視選民之投票決定為成本與代價之計算(cost-benefit calculation)。投票是選民對候選人或政黨間的選擇，而當選民作決定時，必先評估他們的預期效用(expected utility)，然後選擇提供他們最高預期效用的政黨或候選人(Alt & Chrystal, 1983: 152-153)。因此，經濟研究途徑與社會學研究途徑和心理研究途徑不同之點在於前者含有選民是理性之假設，而後二者則不作此假設。不過，經濟學研究途徑並不一定強調經濟是最主要且決定性之因素，但是他們認為在經濟問題普遍受重視且是政府重要責任之時，經濟因素不具影響力是令人驚訝的。

我國在選舉方面之實證調查研究近年來正蓬勃發展，然而目前並未有任何著作對選民是否有經濟投票行為做有系統之研究。經濟因素究竟對選民之投票抉擇是否如美國一樣扮演重要的角色，乃是本文探討的重點。

政大的選舉研究問卷中（雷飛龍、陳義彥等，1991），雖然有個人對自身經濟情況之評估和對國家經濟之滿意度，但是經濟問題只是被用來解釋政黨偏好之變項，並未深入探討選民之經濟投票行為。

爲了瞭解台北縣選民是否有經濟投票行為，本文將採取由徐火炎、游盈隆、吳乃德和黃秀端等四位教授共同主持的「台灣選民投票傾向的形成與轉變：第二屆立委選舉選民投票行為的動態分析」之調查訪問資料。此次調查爲國科會支持之台灣社會意向調查的專題研究。

此計劃是採取三波固定樣本連續調查(panel study)方式。第一波在民國八十一年十月進行訪問，第二波在十一月廿九日至十二月六日間進行訪問，第三波調查則於選舉後立刻進行，訪問期間爲十二月廿日至次年一月二日。選民對於經濟情況評估的題目是在第二波訪問中進行，而選民的投票決定則是在第三波，此種方式雖然與CPS選舉研究把所有題目完全放在同一問卷不同。但是作者以爲對於因果關係中，時間先後的確定，在本研究更具說服力，換言之，在固定樣本連續調查中，我們很容易判斷時間的順序，亦即選民對經濟的評估在投票之前，而其投票決定在後，至於cross-sectional study則無法判斷此兩個變數的時間順序關係。

固定樣本連續調查最大的問題在於受訪者之流失率較高，第一波訪問成功者有1138位。第二波訪問時，尚有937位成功受訪者，但是到了第三波只剩837位，不過就整體而言，此種流失率是可以被接受的。

除此之外，此研究最令人感到遺憾的是母體僅爲台北縣選民，因此作者並不企圖聲稱此研究可以推論到全國選民，不過至少可以藉此拋磚引玉，並建立一個經濟問題與投票行為之模式。

另外，美國的研究顯示選民對國會議員選舉和總統選舉的評估因素並不太相同，經濟因素對於總統選舉的影響遠大於國會議員選舉，此乃與美國總統在經濟所扮演的角色有關。根據1946年的就業法案，總統必須對國家的經濟

情況負責，而今日美國人民也普遍認為總統是國家實質的經濟領袖，他必須為國家的經濟走向，提出一套對策。

由於國內目前並無類似美國總統全國性之選舉，老百姓並無機會表達對於總統或行政院長之去留，立法委員選舉是最重要的全國性選舉，因此選民唯有透過立委選舉來表示他們對執政黨的擁護與否。

欲瞭解選民對於經濟之評估是否影響其投票抉擇，最好是採取G.Marcus (1988, 1992)的方式，亦即以時間序列和橫斷面調查研究之組合，Marcus將其稱為pooled cross-sectional analysis。但是目前我國二屆立委選舉是第一次立委之全面改選，限於事實之限制，並不可能從事pooled cross-sectional analysis之研究，而只能針對八十一年之立委選舉分析。只觀察一次選舉的缺點在於我們無法知道分析的結果是代表一般性之通則，還是只代表一次的選舉特例。

## 自變數與依變數

台北縣有49位候選人參選八十一年度之立委選舉，而應選名額為十六名，其中國民黨提名十三位，民進黨提名六位，另外，兩黨還有多位自行參選者。由於，兩黨提名和自行參選或報准參選者數目太多，因此，我們不以候選人投票為依變項，而是以受試者回答他投給那一黨派候選人為依變項。至於未去投票、投廢票以及拒絕回答者則不包括在內。另外，本文主要在分析經濟問題與黨派抉擇之關係，而在八十一年度台北縣立委選舉中，其它黨派得票率太低，在樣本中之人數過少，因此依變數只有兩個值，0代表國民黨，1代表民進黨。

對於黨派抉擇之解釋變項將包括經濟議題與國家認同議題。

在經濟方面，對於總體經濟的評估，有下列三個問題：

- 第一道問題是對台灣目前整體經濟情況的滿意程度；
- 第二道問題是對台灣未來經濟情況之評估；
- 第三道問題則是選民對於經濟責任歸屬之看法。

1. 整體來說，你對於台灣目前經濟情況感到滿不滿意？



2. 整體說來，你覺得台灣未來的經濟情況會更好還是會更差？

3. 假如台灣經濟情況變壞，您認為誰應該負最大的責任？

對於個人經濟情況的衡量則有三大題：

第一道問題是對於個人目前經濟情況之滿意度。

題目為：請問您對您目前的經濟情況滿不滿意？

第二道問題則是評估個人經濟情況之變化。

題目為：您覺得您目前的經濟情況比去年好或是比去年差？

第三道則是對個人未來經濟情況之評估。

題目為：您覺得您未來的經濟情況，會更好或是會更差？

至於國家認同與政治議題，則有下列兩道題目：

1. 韓國與我國斷交後，關於我國今後外交政策的走向，社會各界有不同的看法，有人主張採取「一中一台」的立場，也有人堅持要繼續「一個中國」的政策。請問您的看法如何？
2. 關於台灣的前途，有人認為未來「台灣獨立建國」比較好；也有認為未來「統一」比較好，請問您的意見是怎樣？

除此之外，為了建立選民黨派選舉之模型，自變數亦將包括對政黨之認同和對於政黨整體表現之滿意度。

對於政黨認同則以第一波問卷中的政黨接受度為指標，其題目為：

「目前國內有兩個主要的政黨，一個是國民黨，另一個是民進黨，請在感情上您比較傾向接受國民黨或民進黨？」

而對於政黨整體表現之滿意度，則有下列兩道題目：

1. 請問您對國民黨近年來整體施政表現的滿意程度為何？
2. 整體說來，民進黨作為一個反對黨，您對他們的表現的滿意程度如何？

## 樣本與抽樣方式

本研究之母體為台北縣年滿廿歲以上之選民。樣本結構(Sampling Frame)為中委會八十年度國大代表選舉人名冊，以二屆國大選舉人名冊為樣本結構

無法包括剛獲得選舉權之新選民，但是在時間壓力以及人力不足之情況，此種方式乃是最迅速和節省人力之方式。

抽樣方式則是採取多階段比例分層抽樣法。第一階段先以行政區域和經動會等級兩個標準，將台北縣地區分為三層：第一層為經動會一級之縣轄市，第二層為經動會一級之鄉鎮，第三層為經動會二、三、四級之鄉鎮。然後根據各層人口比例，決定各層欲抽出之人口數和鄉鎮市單位，鄉鎮市為我們的第一抽樣單位(Primary Selection Unit, PSU)。抽出的鄉鎮市，第一層的縣轄市，包括板橋、三重、永和、中和、新莊和新店；第二層的鄉鎮則有樹林鎮、汐止鎮和五股鄉；第三層之中選點則為金山鄉和林口鄉。其次以村里為第二抽樣單位(Secondary Selection Unit)，根據人口比例，第一、二層之鄉鎮市各抽出五個村里，而第三層則分別抽出兩個村。第三階段則是自各村里中分別抽出若干人，個人是我們最後的抽樣單位。

多階段比例分層抽樣有幾項優點，首先是較低層次的單位隸屬於較高層次之單位，可避免樣本過度分散，以節省人力、時間和精力。另外，比例分層抽樣可以保證母體中不同的團體適當的被代表，以增加對母數估計之精確度(Nachmias & Nachmias, 1987: 189-190)。除此之外，比例分層抽樣可以確保每一階層之樣本數與母體之比例相符合，使得準確度增加。

## 北縣選民是否有經濟投票行為

前面提到美國選舉實證研究結果顯示sociotropic hypothesis的解釋力高於pocket hypothesis。當然以國家的經濟情況來衡量並不見得表示選民就是完全利它主義者，很可能他們是相信國家總體經濟情況改善，個人也會因此而蒙受其利(Kinder and Kiewiet, 1981: 132)。不過，sociotropic hypothesis至少還隱含著選民有社會目標或社會需求之取向，而不僅僅是個人主義或自私自利的取向而已(Meehl, 1977)，究竟我國選民是以國家整體的經濟利益來考慮呢？還是僅是顧慮個人經濟情況的好壞呢？此乃本文研究重點。選民考慮的角度不同，將會對政府政策產生強烈暗示作用。

民眾關心經濟問題並不表示民眾便會以政府在經濟之表現來決定政府的去留。唯有當民眾以為政府應當為經濟情況之好壞負責時，選民的投票才可能反映國家經濟之榮枯，選民刻以政府的責任乃是經濟表現與選民抉擇之間的連結(Fiorina, 1981; Lewis-Beck, 1988, chap. 6)。此種關鍵性的連結不僅反映於選民個人的觀點，且反映整個政治決策的本質和政府對於公共政策的控制(Powell and Whitten, 1993:398)。當政府的結構或組成不是一黨所能控制時，選民便無法將經濟情況的好壞歸咎於某一個政黨，由多黨組成的聯合政府如義大利與只有單一政黨執政的英國相比較，自然後者之政治責任較為明確，而政府也會因為政策之失敗付出選舉失敗的代價(Lewis, 1988: 108-109)。反之，多黨聯合政府，政黨的責任分散，使得選民不知責任之歸屬，因此也難以刻以某一個政黨政治責任。

Powell和Whitten (1993)對於十九個工業化民主國家的總體經濟跨國性研究顯示，經濟因素對於執政黨得票率之影響只有在政府責任明確的國家發生。反之，在責任不明確的國家中，經濟與執政黨得票率之關係並不顯著。

就我國目前情況而言，國民黨長期執政，自總統、行政院院長、立院多數黨皆是清一色的國民黨籍，因此選民對於政府政策成敗之歸屬並不困難。根據我們的調查研究結果顯示，有百分之三十九點四之選民認為「假如台灣經濟情況變壞」政府應該負最大的責任，另外有百分之五的民眾認為國民黨應該負責任。政府和政黨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但是由於國民黨長期執政，因此兩者加起來共佔百分之四十四點四，其它認為民進黨應負責的佔百分之四點七，企業家佔百分之九點一，勞工佔百分之二點四，中共佔百分之一點六，國際因素佔百分之十二點八。雖然認為國民黨和政府應該為經濟轉壞負責之比例並未超過半數，但是和其它各項比較起來，百分比已相當高。另外，題目設計本身強調的是誰應為經濟情況變壞負責任，如果我們將題目改為「誰應為台灣經濟情況的好壞負責」那麼筆者相信認為政府應該負責的百分比會更高。

大體上台北縣選民對於台灣目前經濟情況尚稱滿意，其中非常滿意的有8%，還算滿意的有66.7%，不滿意的18.3%，非常不滿意只有2.3%。選民對

於台灣目前經濟情況之滿意度與他們對政黨情感上之接受度呈現顯著相關。在情感上認同國民黨者中，有79.5%表示對目前國家經濟情況感到滿意，而認同民進黨者，只有64.7%感到滿意，不過，他們之間的相關係數並不高，只有0.15。大體而言，不管是民進黨或國民黨之認同者，對我國的經濟情況都還算相當滿意。

表一顯示台北縣選民對於台灣目前經濟情況的滿意度之看法與投票給那一黨之間的關係，我們可以看出對於經濟情況非常滿意者，投給國民黨的百分比高達79.2%，還算滿意的也有71.4%，至於對於經濟情況不滿者，投給國民黨的百分比便相對下降許多，只剩58.72%，而於對於經濟情況很不滿意者投給民進黨者多於國民黨，分別為58.3%與40%。而投給無黨籍者則不因為對經濟情況的看法而有所不同，此點值得我們日後探討。

表一：總體經濟滿意度與黨派抉擇

	非常滿意	還算滿意	無意見	不滿意	很不滿意
國民黨	79.2	71.4	82.4	58.7	40.0
	(42)	(315)	(14)	(71)	(6)
民進黨	13.2	21.5	17.6	33.9	58.3
	(7)	(95)	(3)	(41)	(8)
無黨籍	7.5	7.0	0	7.4	6.7
	(4)	(31)		(9)	(1)

★ 未參加投票以及投給其他黨派者未包括在內。

$$X^2 = 22.59, df = 8,$$

$P < 0.05$ ，達統計顯著水準。

$$\text{Contingency Coefficient} = 0.182$$

對於個人目前經濟情況感到越滿意支持國民黨的百分比便越高，但是在統計上並未達到0.05的顯著水準（見表二）。有些時候，我們雖然對目前個人的經濟情況感到不甚滿意，但是有可能雖然尚未達到個人追求之目標，不過已有所改善，在此種情況之下，我們也可能繼續支持執政黨。表三可以看出如果與去年的經濟情況相比，覺得情況比去年好者較覺得比去年差者，確實傾向於投票給執政黨，此兩者關係達統計上之顯著水準。由此可見，選民對自身經濟情況是否改善的看法比他對本身經濟情況滿意與否較影響他的投票行為。至於，選民對於自身未來經濟情況的評估與其投票抉擇並未呈顯著相關，顯示我國選民的投票似乎是屬於回顧取向(retrospective)，而不是未來取向(prospective)。

選民認為自身經濟情況改善者，對於總體經濟之評估亦較滿意，兩者之相關係數為0.35，比美國的0.2稍高，不過基本上仍可以看出此兩個概念在選民心目中還是不同的。

表二：個人經濟滿意度與黨派抉擇

	非常滿意	還算滿意	無意見	不滿意	很不滿意
國民黨	71.4 (25)	71.9 (307)	70.0 (7)	64.2 (113)	46.2 (6)
民進黨	22.9 (8)	21.1 (90)	10.0 (1)	29.5 (52)	38.5 (5)
無黨籍	5.7 (2)	7.0 (30)	20.0 (2)	6.3 (11)	15.4 (2)

$$X^2 = 11.77, \text{ df} = 8,$$

P > 0.05 未達顯著水準

表三：個人經濟情況之變化與黨派抉擇

	變好	差不多	變壞	無意見
國民黨	76.6 (131)	69.8 (220)	61.8 (105)	50.0 (3)
民進黨	14.0 (24)	23.5 (74)	32.4 (55)	50.0 (3)
無黨籍	9.4 (16)	6.7 (21)	5.9 (10)	0

$$X^2 = 19.08, df = 6,$$

$P < 0.001$ ，達統計顯著水準。

$$\text{Contingency Coefficient} = 0.167$$

究竟個人經濟情況的變化和對總體經濟的評估，那一個變數對選民之黨派抉擇較具影響力呢？爲了瞭解此問題，筆者乃以洛基迴歸分析法(Logistic Regression)，同時將此兩個經濟變項放入迴歸模型中。

由於我們的依變數是名份變數(Categorical Variable)，只有投票給國民黨或民進黨兩個值，因此無法用一般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來分析。否則將會違反最小平方法的假設，亦即依變數必須是具有連續性的測量，以及它的誤差項的變異量是相等的，且具有常態分配等特性的基本假定(Blalock, 1979)。至於洛基迴歸分析法的依變數可以是二元或多元的名份變數，而不違反誤差變異量相等之前提，同時又可將兩個或兩個以上之自變數放入整個模型中來分析。

根據洛基迴歸統計分析結果顯示，個人經濟情況變化與對總體經濟滿意度兩者與投票行爲呈顯著相關（見表四，Model I）。此兩個變數中，對總體經濟情況滿意度之R值爲0.1237稍大於個人經濟情況變化之R值0.1059，表示經濟情況滿意度對此模型之貢獻大於個人經濟情況變化，但是此模型之goodness

of fit並未令人滿意，特別是對於民進黨支持者之預測力顯然過小，對投票給國民黨者之正確預測力為99.55%，但是對於投票給民進黨者之預測力卻只有3.29%，顯然，經濟問題並非解釋選民投票支持民進黨之因。因此，我們有必要更進一步探討究竟是何種因素促成選民投票給民進黨？

表四：經濟情況、政治議題與黨派抉擇

	<u>MODEL I</u>		<u>MODEL II</u>	
	<u>B</u>	<u>R</u>	<u>B</u>	<u>R</u>
經濟問題				
國家經濟情況	0.338**	0.1237	0.274*	0.0669
個人經濟情況	0.426*	0.1059	0.154	0
政黨情感接受度				
國家認同與政治議題				
國民黨	——	——	-1.629**	-0.2417
民進黨	——	——	2.698**	0.2347
Constant	-2.7981**		-1.6549**	
-2 Log Likelihood	651.48 (P=0.0572)		475.00 (P=0.9994)	
Goodness of Fit	596.26 (P=0.4893)		578.58 (P=0.4971)	
% of Correctly	75.13%		83.05%	
Predicted	(國民黨 = 99.55% 民進黨 = 3.29%)		(國民黨 = 98.39% 民進黨 = 37.84%)	

\*\* p<0.01

\* p<0.05

中國人傳統上厭惡政黨，視政黨為國家之禍害，因此有「君子群而不黨」之說。再加上，解嚴之後才開放黨禁，允許政黨競爭，因此在短短幾年之內，要培養選民之政黨認同，實屬不易。除此之外，大選區制度的採取，使得同黨候選人必須相互競爭相互攻擊，更加使得政黨投票取向難以形成。不過，爲了瞭解政黨對選民投票行爲的影響，國內一般選舉研究，常採用「政黨偏好」、「政黨傾向」與「政黨形象」等概念來衡量選民對政黨的心理或感情認同（胡佛等，1987,1990；電飛龍、陳義彥，1987,1991；徐火炎，1991a, 1991b, 1993）。他們也發現對政黨的偏好確實會影響選民之投票抉擇，雖然其影響力不如政見及候選人。因此，筆者決定將「政黨接受度」放入洛基迴歸模型中。政黨接受度是問受訪者在感情上比較傾向接受國民黨或民進黨，此題是在選前訪問而不是選後，因此較能代表受訪者對兩黨的真實感覺。由表四中顯示，當政黨接受度加入之後，經濟滿意度的顯著水準消失，而正確預測百分比由原來的75.13%增爲81.64%，對民進黨支持者之預測雖由3.29%提高爲37.84%，卻仍未超過50%，亦即表示還有其它的因素決定選民投票給民進黨的原因。（見表四之Model II）。

我國自1986年解嚴至今只有七年的時間，仍處於所謂的政治轉型，民進黨和國民黨對於國家認同，憲政體制等政治議題仍有明顯歧異，不似歐美民主國家，這一類的問題早已具有共識，因此不成爲政黨間之爭執。就如同游盈隆(1993)教授所言，目前我國的選舉議題多屬於象徵性的議題，而對於其它公共政策的訴求反而較少，因此我們有必要考慮政治議題的問題。

當我們只考政治議題和經濟議題時，我們可以從表五(Model III)得知對總體經濟之評估，主張一中一台、一個中國和台灣獨立建國皆與選民之黨派投票成顯著相關。主張一中一台和台灣獨立建國者較傾向於投票給民進黨，而主張一個中國政策者則較支持國民黨，此模型之預測力爲84.31%，而對民進黨之預測力則爲52.52%，比政黨接受度之預測力較好，由此可見象徵性議題在我國選舉中之重要性，而且當象徵性之議題列入自變項時省籍因素便不再具有顯著水準。



表五：決定黨派投票之因素

	MODEL III		MODEL IV		MODEL V	
	B	R	B	R	B	R
經濟問題						
國家經濟情況	0.274**	0.0669	0.192	0	—	—
個人經濟情況	0.154	0	0.019	0	—	—
國家認同與政治議題						
一中一台政策	0.924**	0.0888	0.774	0.0442	—	—
一個中國政策	-1.214**	-0.1259	-0.910*	-0.0678	-1.355**	-0.1647
台灣獨立建國	1.387**	0.1373	0.827	0.0446	1.454**	0.1623
統 一	-0.347	0	-0.346	0	—	—
政黨情感接受度						
國民黨	—	—	-0.642*	-0.0563	-0.810**	-0.0888
民進黨	—	—	2.064**	0.1504	2.240**	0.1764
政黨表現滿意度						
對國民黨滿意度	—	—	0.104	0	—	—
對民進黨滿意度	—	—	-0.488	-0.1284	-0.462**	-0.1237
Constant	-2.0296**		-0.2883**		0.5799	
-2 Log Likelihood	431.81 (P=0.9998)		329.78 (P=1.000)		339.24 (P=1.000)	
Goodness of Fit	558.08 (P=0.2966)		442.96 (P=0.9746)		458.16 (P=0.9824)	
% of Correctly	84.31%		86.38%		86.79%	
Predicted	(國民黨=95.11% 民進黨=52.52%)		(國民黨=94.3% 民進黨=62.5%)		(國民黨=95.24% 民進黨=61.07%)	

\*\* p&lt;0.01

\* p&lt;0.05

除了議題與對政黨的情感取向之外，選民對於政黨表現的看法也能影響選民投票之抉擇，因此，筆者為建立一個較為完整之理論模型，遂將此幾項變數共同放入洛基迴歸公式中，此模型之預測力增為86.38%，Goodness of Fit也提高（見表五，Model IV）。不過，在此模型中有幾個變數不見顯著水準，

為了使理論更具有簡約性(parsimony)，將不具顯著水準的變數去除（見表五，Model V），其正確預測力不減反而稍增，而Goodness of Fit更好，此時經濟情況的解釋力完全消失。最重要的變數是對民進黨之情感接受度，換言之，愈認同民進黨的人越傾向票給民進黨。緊接著是兩個議題因素，主張一個中國政策者較傾向於支持國民黨，而主張台灣獨立建國者則較支持民進黨。至於在政黨整體的表現方面，對國民黨之整體表現滿意度並不具顯著水準，但是對民進黨之表現感到滿意者則明顯地較支持民進黨候選人。

### 為何經濟因素不具解釋力？

由以上分析得知，經濟情況的影響力遠不如預期，造成此種結果之原因可能與民眾並不認為經濟問題是目前國家最迫切、最需要解決的問題有關。當北縣選民被問及「你覺得我們國家當前最重要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回答與經濟問題有關的只有10.5%；反之，回答國家認同與政治議題是目前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之百分比卻有33.4%，遠高於經濟議題。同時，台北縣選民對於我國目前整體經濟情況尚稱滿意的比例相當高，其中非常滿意和相當滿意的百分比總共為73%（包括未去投票者）。至於對於個人經濟情況感到滿意者也佔受訪者之69.6%。在此種情況之下，選民便不可能以經濟為首要考慮；反觀，美國選民近二十年來至少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選民認為經濟問題是國家最重要、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而在1992年總統選舉前，竟然有百分之九十三之民眾認為經濟問題是美國所面臨最重要的問題，尤其是近年來美國經濟不景氣，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同時發生，使用選民更深深感受經濟蕭條帶給他們生活上的壓力。

另外，經濟問題近年來一直是美國重要的選舉議題；反之，北縣選民認為經濟是兩黨爭論最激烈的問題，只佔投給兩黨者之1.8%。同時，回答經濟問題是選舉過程中最常聽見的議題也只有1.7%。很顯然地，經濟議題在選舉中並不成氣候。

Carmies和Stimson (1980:78)將議題投票分為兩種類型。第一種類型為困難

的議題投票(hard issue voting)，來自於Anthony Downs的理論傳統，他們認為議題投票是選民對於成本與利益的理性計算，並將其估算結果指引其投票決定，經濟投票可以說是屬於此類型。第二種類型是容易的議題(easy issue voting)，是耕植於選民很常一段時間的議題，所以選民能對政黨或候選人之立場做立即之反應。所謂的容易的議題，至少具有下列三個條件：a.它是屬於象徵性的(symbolic)，而非技術性的。b.容易議題多是涉及政策目的，而非政策手段。c.它可能是存在多時，且被討論已久之公議題(Carmies and stimson, 1980:80)。象徵性的問題較技術性問題容易向民眾溝通，使選民瞭解。目前象徵性問題或容易議題構成了台灣國會層次選舉議題的主要內涵（游盈隆，1993:14）。而當象徵性議題成爲競選主題並足以引起選民情緒性反應時，就可能激發出較普遍的政見取向(Sears, Lau, Tyler & Allen, 1980)。33.9%的台北縣選民認爲最常聽到的選舉議題爲統獨問題和台灣前途問題，另外有53.6%的選民覺得國民黨與民進黨在的統獨問題和台灣前途問題的爭論最激烈。從另外一個統計數字，我們更可以看出統獨問題符合easy issue之條件，即台北縣選民對於兩大黨在此方面議題的立場之認知相當正確。對於一個中國政策或一中一台的問題，有78.6%投票給兩大黨之選民知道國民黨主張一個中國政策，而只有2.3%的民眾認知是錯誤的，另外有15.3%表示不知道。而對於民進黨主張一中一台政策之立場，高達83.3%的選民認知正確，只有1.3%認知錯誤。至於對於台灣前途的看法，認爲國民黨主張台灣獨立者只有0.6%，而認爲國民黨主張統一的有74.3%，維持現狀不統不獨的則有7.5%；另外，有83.3%之選民認爲民進黨的立場是主張獨立，只有0.5%之投票者認爲民進黨主張統一。

由交叉分類表顯示，本文中的兩個象徵性議題與黨派抉擇之關係分別爲0.47與0.48，比經濟情況與黨派抉擇之相關係數之0.18與0.17要高很多（見表一、表三、表六、表七）。

國內選舉研究對於政見影響力的大小，研究結果相當紛歧（陳義彥，1991: 63-64）。這些研究中，有些是直接問受訪者「投給某位候選人最重要的因素是什麼？」凡是回答候選人政見較符合人民之需要者，就將其歸爲政見選舉。此種方式過於籠統，我們並不知道投票者是否瞭解候選人立場，並選擇其立

場與其相符者。陳義彥和黃麗秋(1986)則企圖進一步將政見與候選人結合，他分析1985年的台南縣縣長選舉結果發現，真正瞭解候選人政見，並且認為其政見重要而投給該候選人者，只佔全體選民之少數。而1989年之台北縣縣長選舉中，政見取向雖然提高，但是仍舊有限（陳義彥，1991）。筆者以為該研究中所提之國號更改與總統直選問題，並不應是縣市長選舉議題，因為更改國號和總統選舉並非縣市長層次所能處理的。而對於更改國號和總統直選議題比本文所提之兩個議題較傾向技術層次，選民之認知較為困難。至於對台南縣候選人政見取向之分析中所提到之政見，如充實警察設備，加強防治水污染，興建動物園與水族館等問題皆是屬於困難議題，選民自然不易瞭解（陳義彥，黃麗秋，1986）。根據前面分析北縣選民對兩黨在國家認同和台灣未來前途之認知，出乎意料之精確；選民對這些問題之立場，相當程度地影響了他們對黨派抉擇。與其它因素相比，選民對「一中一台」和「一個中國政策」的看法，共同構成了黨派投票最重要因素，因此其影響力不可輕忽（見表五）。

兩黨對於經濟問題之態度並不明顯，且選民也不認為經濟問題是重要議題，因為象徵性議題仍是構成我國立委選舉中重要之議題，所以經濟情況便很難發揮其影響力。

表六：「一中一台」或「一個中國」政策與黨派抉擇

	一中一台	一個中國	無意見	不知道
國民黨	34.6% (46)	92.4% (293)	72.4% (71)	72.7% (32)
民進黨	65.4% (87)	7.6% (24)	27.6% (27)	27.3% (12)

$$X^2=166.15, df=3$$

$$p<0.001$$

$$\text{Contingency Coefficient}=0.47$$

$$\text{number of observations}=615$$

表七：台灣未來前途與黨派抉擇

	獨立	統一	維持現狀	無意見	不知道
國民黨	25.3 % (24)	90.0 % (262)	77.2 % (115)	70.2 % (33)	76.7 % (23)
民進黨	74.1 % (71)	10.0 % (29)	22.8 % (34)	29.8 % (14)	23.3 % (7)

$X^2=159.99$ ,  $df=4$ ,

$p<0.001$

Contingency Coefficient = 0.46

number of observations=612

## 結 論

在經濟與政治關係日益密切以及經濟對於我們日常生活之影響日益加深之今天，學者不得不關切選民對於經濟情況的態度是否會影響其投票意向。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在此方面的研究指出選民對於總體經濟情況之看法確實會影響其投票行為，且選民對於整體經濟情況之主觀看法，相當程度地反映了客觀之經濟指標。至於選民對於個人經濟狀況之看法雖然也會影響選舉結果，但是其影響力不若前者，且較為不穩定。

根據筆者對於台北縣立委選舉研究發現，選民對於國家經濟整體之看法以及對個人自身經濟情況之評估皆與黨派抉擇呈現顯著之相關，但是相關係數並不高，而且當其它因素加入時，經濟之影響力便因此而消失。

經濟因素對台北縣選舉不具解釋力，可能與我國選民不認為經濟問題是目前最重要最迫切需要解決之問題有關。在統獨問題和台灣前途問題等象徵性議題仍舊是構成選舉中重要的主題時，經濟問題之影響力不易顯現是可以理解的。

## 參 考 書 目

- Abramowitz, Alan I. "Economic Conditions, Presidential Popularity, and Voting Behavior in Midterm Congressional Elections," Journal of Politics 47 (1985): 31-34.
- Alt, James & Alec Chrystal. Political Econom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 Berelson, B. R., P. F. Lazarsfeld and W. N. McPhee. Vot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54.
- Blalock, Jr. Hubert M. Social Statistics. Revised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 Bloom, Howard S. and H. Douglas Price. "Voter Response to Short-run Economic Conditions: the Asymmetric Effect of Prosperity and Recess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9 (1975): 1240-54.
- Brody, Richard and Paul Sniderman. "From Life Space to Polling Place: The Relevance of Personal Concerns for Voting Behavior."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7 (1977): 337-60.
- Campbell, Angus, et. al. The American Voter. New York: John Wiley, 1960.
- Carmines, Edward G. and James A. Stimson. "The Two Faces of Issue Voting."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9-1 (March 1980): 78-91.
- Erikson, Robert S.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the Presidential Vot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3-2 (June 1989): 567-73.
- Fair, Ray C. "The Effect of Economic Events on Votes for President."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60 (May 1978): 159-173.
- Feldman, Stanley. "Economic Self-interest and Political Behavior."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6 (1982): 446-66.
- Feldman, Stanley. "Economic Self-interest and the Vote." In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Electoral Outcomes, Edited by Heinz Eulau and Michael S. Lewis-Beck,

New York: Agathon, 1985, pp.144-443.

Goodhart, C. A. E. and Bhansali, R. J. "Political Economy." *Political Studies* 18 (1970): 43-106.

Goodman, S., and G. Kramer. "Comment on Arcelus and Meltzer, the Effect of Aggregate Economic Conditions on Congressional Electio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9 (1975): 1255-1265.

Henski, Henry. "The Impact of Economic Conditions on Presidential Popularity." *Journal of Politics* 39 (August 1977): 764-773.

Hibbs, Douglas A. Jr. "The Mass Public and 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Dynamics of Public Opinion toward Unemployment and Infl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3-4 (November 1979): 705-731.

Hibbs, Douglas A. Jr. *The American Political Econom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Kernell, Samuel. "Explaining Presidential Popularit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2 (1978): 502-522.

Kiewiet, D. Roderick. *Microeconomics & Micropolitics: The Electoral Effects of Economic Issu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Kinder, Donald R. and D. Roderick Kiewiet. "Economic Discontent and Political Behavior: The Role of Personal Grievances and Collective Economic Judgments in Congressional Voting,"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3 (1979): 495-527.

Kinder, Donald R. and D. Roderick Kiewiet. "Sociotropic Politics: the American Cas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1 (1981): 129-61.

Kirchgassner, Gebhard. "Causality Testing of the Popularity Function: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for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1971-1982." *Public Choice* 45 (1985a): 155-173.

Kirchgassner, Gebhard. "Rationality, Causality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the Popularity of Partie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8

(1985b): 1-12.

Klorman, Ricardo. "Trend in Personal Finances and the Vot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42 (1978): 31-48.

Kramer, Gerald. "Short-term Fluctuations in U. S. Voting Behavior, 1896-1964."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5 (1971): 131-143.

Lafay, Jean-Dominique. "Important 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Stability of the Popularity Func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French Election of 1981." In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Electoral Outcomes, Edited by Heinz Eulau and Michael S. Lewis-Besk, New York: Agathon, 1985, pp. 78-97.

Lepper, Susan. "Voting Behavior and Aggregate Policy Targets." Public Choice 18 (1974): 67-81.

Lewis-Beck, Michael. Economics and Elections: The Major Western Democraci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8.

Lewis-Beck, Michael B. & Tom Rice. "Forecasting U. S. House Elections." 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 9 (1984): 475-86.

Mackuen, Michael B. "Political Drama,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the Dynamics of Presidential Popularity."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83): 165-192.

Markus, Gregory B. "The Impact of Personal and National Economic Conditions on the Presidential Vote: A Pooled Cross-sectional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2-1 (February 1988): 137-154.

Markus, Gregory B. "The Impact of Personal and National Economic Conditions on the Presidential Voting, 1956-1988,"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6-3 (August 1992): 829-834.

Meehl, Paul. "The Selfish Voter Paradox and the Thrown-away Vote Argu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1 (1977): 11-30.

Nachmias, David & Nachmias. Research Method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Third Edi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7.

Nordhaus, William. "The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42



(1975): 169-190.

Norpoth, Helmut. "Economics, Politics and the Cycle of Presidential Popularity."

Political Behavior 6 (1984): 252-73.

Powell, G. Bingham Jr., and Guy D. Whitten. "A Cross-National Analysis of Economic Voting: Taking Account of the Political Contex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7-2 (May 1993): 391-414.

Schlozman, K. and S. Verba. Injury to Insul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Sears, David O., Richard R. Lau, and Tom R. Tyler. "Self-Interest vs. Symbolic Politics in Policy Attitudes and Presidential Voting."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4 (1975): 670-684.

Tufte, Edward. "Determinants of the Outcomes of Congressional Electio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9 (1975): 812-26.

Weatherford, M. Stephen. "Economic Voting and the 'Symbolic Politics' Argument: A Reinterpretation and Synthesi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7 (1983): 158-74.

胡佛等人，《選民的投票行爲》，中央選舉委員會印，中華民國七十六年。

胡佛等人，《選民的投票行爲：民國七十五年增額立法委員選舉的分析》。

中央選舉委員會印行，中華民國七十九年。

徐火炎，「政黨認同與投票抉擇：臺灣地區選民的政黨印象、偏好與黨派投票行爲之分析」，《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四卷第一期，中華民國八十年。頁1-57。

徐火炎，「選民對政黨的評估態度與黨派投票抉擇」，《政治科學論叢》，第四卷第一期，中華民國八十年，頁185-209。

徐火炎，「選民對政黨政治價值取向、政黨認同與黨派投票抉擇：第二屆國大代表選舉選民的投票行爲分析。」《台灣地區社會意向調查資料運用學術研討會》。台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三月。

雷飛龍、陳義彥等人，《轉型社會中的投票行爲：台灣地區選民的科際整合研究》。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計劃，中華民國七十六年。

雷飛龍、陳義彥等人，《台灣地區選民的投票行爲：一個理論模式的探索》。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計劃，中華民國八十年二月。

陳義彥、黃麗秋，「選民政見取向的再探討」，《投票行爲與選舉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國政治學會，中華民國七十五年。

游盈隆，「當前民意的特質與結構——二屆國大選民的分析」，《台灣地區社會意向調查資料運用學術研討會》。台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三月。

##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Voters' Choices**

**Shiow-Duan Hawang**

With the expansion in the size and scope of government during this century there has surely been a concomitant increase in the electoral importance of the economy.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hundred of public polls have shown that economic problems to be the major source of public concerns in most western democratic countries, particularly in the United States. Most studies indicated that voters who believed that the nation's economy was doing well tend to support the incumbents, while those who believed that it had worsened tend to vote for the challengers. Moreover, massive swings in overall perception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occur in response to objective economic conditions.

This paper intended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the voters' responsiveness to changing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perception of personal financial conditions on their party choices in Taipei county during the second term legislative election.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survey result, the author find that both public assessment of national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perception of personal financial conditions are not very important in influencing voters' decisions when compared with other variables, such as party identification, perception of party performance and other symbolic issues. Most people tend to view national identity and Taiwan's future problem as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facing this country today, while they do not regard economic issue as an urgent condition. When national identity and Taiwan's future problems still constituted the major issue concern during the 1992 election, there is no surprise that the importance of economic variables has been downplayed.